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美】李榭熙 著

雷春芳 译 【美】周翠珊 审校

圣经与枪炮

基督教与潮州社会(1860~1900)

The Bible and the Gun

Christianity in South China,
1860-1900

圣经与枪炮

基督教与潮州社会(1860~1900)

【美】李榭熙 著

雷春芳 译 【美】周翠珊 审校

The Bible and the Gun
Christianity in South China,
1860-190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圣经与枪炮：基督教与潮州社会：1860~1900 / (美) 李榭熙著；雷春芳译；(美) 周翠珊审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0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ISBN 978-7-5097-1358-7

I. ①圣… II. ①李… ②雷… ③周… III. ①基督教史—潮州市—1860~1900 IV. ①B9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34403 号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圣经与枪炮——基督教与潮州社会 (1860~1900)

著 者 / [美] 李榭熙
译 者 / 雷春芳
审 校 / [美] 周翠珊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 政 编 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
项目经理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袁卫华 钟纪江
责任校对 / 韩海超
责任印制 / 郭妍 岳阳 吴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mm × 1240mm 1/32
印 张 / 10.5 字数 / 275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1358-7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2008-3129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3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大正 于 沛 朱诚如

成崇德 李文海 陈 桦

邹爱莲 孟 超 徐兆仁

戴 逸

编译丛刊编委会

主编 于 沛

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美〕孔飞力 王大庆 王 江

王晓秋 〔法〕巴斯蒂夫人

〔德〕达素彬 〔俄〕米亚斯尼科夫

朱政惠 刘 东 张西平

〔英〕吴芳思 杨念群 赵世瑜

耿昇 徐 浩 徐思彦 钱乘旦

虞和平 戴 寅

THE BIBLE AND THE GUN
Christianity in South China, 1860-1900

Joseph Tse-Hei Lee

ROUTLEDGE
New York & London

Joseph Tse-Hei Lee, *The Bible and the Gun:
Christianity in South China, 1860 -1900*
Taylor & Francis Books, Inc. , 2003

本书根据泰勒·弗兰西斯出版社 2003 年版译出

总 序

纂修清史是我国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它包括3000余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及文献、档案整理和编译工作。广大史学工作者正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做好清史编纂工作，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世界各国从分散发展到趋于一体，大抵从15世纪、16世纪开始，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清朝从1644~1911年共延续了268年，这是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的转折时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却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使封建社会的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洋枪洋炮面

前不堪一击；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18世纪世界历史的大变局中，康乾盛世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落日的辉煌”，而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清朝日益衰颓，已奏起了“落日的挽歌”。因此，研究清史，确定它的基本内容，以及确定研究它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时，不能脱离清王朝社会发展过程中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编纂清史时要有世界眼光，这已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不仅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还要放眼世界，博采众长，搜集和积累世界各国人士关于清代中国的大量记载，汲取外国清史研究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正是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以下简称“编译丛刊”）。

清朝建立之初，与世界各国曾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接触。后来中国的大门一度被关闭而后再被强行打开，这期间，外国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军队、探险家、科学考察队蜂拥进入中国，东方古国的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惊奇。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他们记录下在华的所见所闻。这些记录数量浩瀚，积存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或私人手中，成为了解清代近三个世纪历史的珍贵资料。由于西方人士观察、思考和写作习惯与中国人不同，他们的记载比较具体、比较广泛、比较



注重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因而补充了中国史料记载的不足。“编译丛刊”将从中选取若干重要资料译介绍国内的读者；对早年问世的具有开拓性、奠基性价值，但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的作品，我们也将同样给予关注；此外，对反映当代国外清史研究新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的学术专著，“编译丛刊”也将及时地介绍给中国学术界。

从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出发，有选择地介绍国外新史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是必要的。如西方历史学家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主要是强调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拓宽历史研究的选题；又如提倡“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努力将社会精英的历史变成社会大众的历史，将千百年来隐藏在历史幕后的社会大众推上历史的前台。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研究整体化趋势的推动下，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分支学科，如社会史、人口史、民俗史、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心理史、社会生态史、环境史、妇女史、城市史、家庭史等等，对于纂修清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这些都将在“编译丛刊”的作品中有所体现。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不同文明间不断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任何国家的文化都是通过与异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获得营养，从而不断发展壮大。纂修清史必须排除闭关自守的文化排外主义的干扰，破除中西对立的僵化思维方式，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对待国外清史研究的一切成果，因为它们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愿“编译丛刊”在新世纪中外文化交流

的广阔背景下，作为一座科学的桥梁、友谊的桥梁，为纂修清史做出更多的贡献。

于 沛
2004年5月

导 读

清嘉庆十二年（1807），英国伦敦传道会的马礼逊来到广州传教，成为近代第一个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基督教传教士。此后，随着两次鸦片战争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基督教传教士不断拓展在华传教的空间。1858年6月，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美、俄各国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其中规定各国传教士有在中国内地传教的权利。从此直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近半个世纪，是西方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建立传教机构的时期，也是基督教近代在华传教史上从沿海进入内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李榭熙教授的这部著作，将视角投向19世纪后半叶的华南地区，将视域转移到农村和下层，以1860~1900年为区间，对基督教进入华南内地的过程进行了细致、生动的考察。

诚如作者在“导言”中所言，该书试图打破“西方中心论”、“帝国主义侵华论”、“中西文化冲突”和“挑战与回应”等既有框架，重建一种“地方观点”，建立一个以中国基督教群体为中心的历史观。正是基于这种理论关切，作者从19世纪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的广阔历史画卷中，选择了潮州这个在基督教从沿海传入内地的过程中有着重要意义的东南小区域，并结合特定的历史时空因素，对该地区乡村基督教群体的兴起和发展、基督教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以及西方传教团体与中国信徒群体的互动关系等问题进

行了细致入微的考察和探讨。作者希望“从中国社会的视野了解基督教运动，并重建‘自下而上的历史’”。

关于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长期以来形成了诸多范式。这些范式大多是从宏观的角度分析探讨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对立”的层面，其中的主角也都是西方传教士、中国官员、知识分子、社会上层等更具有“影响力”的人物。然而，不论这种“对立”如何存在过并影响了历史，客观的事实是基督教最终不但在中国落地生根了，并且开始了本土化的历程。那么，在这种整体和宏观上对立的情况下，传教士是如何与中国的普通民众走到一起，进而引领他们信仰基督教的呢？除了医疗、教育等方式手段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吸引了中国民众？尤其是在1840年以来国门逐渐被迫开放之后，基督教是如何从沿海港口城市逐渐深入到内陆腹地的？基督教在华的传教是否总是一贯地遵循“主动传教—被动接受”的模式？在最底层的乡村社会层面上，基督教的传教活动是怎样的一番景象？这些问题，传统的范式或者解答不了，或者解答得不够真切、细致和生动。然而，对于中国基督教史这个课题而言，这些问题不但有趣，而且非常重要。可喜的是，李榭熙教授的这本著作已为解答上述问题作了积极的努力。

在书中，作者首先构建了潮州地区的基督教传教士群体网络，指出移民东南亚的海外华人基督徒回乡传教是该地区基督教发展传播的最初动力，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西方传教士的独一主体地位。作者进而选取了潮州地区四个基督教传教活动比较典型的乡村进行个案研究，细致入微地分别探讨了基督教从东南沿海进入内地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发生的基督教群体与非基督教群体之间、基督教与天主教等宗派之间以及基督教内部的教派之间的冲突与对抗。作者对这些对抗的探讨，摆脱了传统的理论范式，从乡村社会的层面上构建了一部草根基督徒群体的历史，然而这样的构建却显现出了别样的效果——传统范式所关怀的文化对抗因素、反帝排外



因素等，却得以在乡村社会层面上以一种更加自然、真实的面貌展现出来。在视角上，作者着重分析了基督教如何成为地方乡村争斗中可资利用的外部资源，从而卷入华南地区广泛存在的乡村械斗之中，乃至成为地方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作者指出，恰恰是这种“资源”优势，吸引了当地乡村民众对基督教的主动亲近，成为了基督教在当地乡村落脚、生根、发芽的最初动力。而且，因为乡村地区有着这样的内在动力，因此基督教在从沿海进入内地的过程中，乡村地区的传教事业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乡村教会也远比城镇教会兴旺和繁荣。此外，由于作者是以社会史和区域史的角度，将基督教传教问题放在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综合考量各方面因素展开分析和叙述，加上大量利用了国内少见的英美传教、外交方面的档案资料和作者本人的田野调查资料，因此对乡村基督教群体的分析格外平实真切。诚如作者所言，只有切实地考察乡村信徒的生活画面，我们才能理解潮州地区基督教传教运动的内在动力。

过去中外学者多从外交史、文化史、经济史等角度研究基督教传教问题，鲜有从地方史入手。本书作者以 19 世纪末期广东潮汕地区美国北方浸信会（American Northern Baptist Mission）和英国长老会（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建立的教会村落为研究重点，把这些村落的信徒视为地方上的政治群体，充分利用中外官方的档案、传教机构档案文献、传教士私人档案、地方史料以及田野调查资料，具体地探讨这些基督教乡村群体兴起的过程，并将民教冲突置于华南地方村落内部利益集团斗争的脉络中，作了细致而又生动的梳理和分析，勾画了一幅乡村民众利用基督教新教（及其不同教派）作为新的政治资源，积极地参与地方利益纠纷的真实画面。

作者在近乎写实的描画和分析后指出：第一，华南乡村基督徒把宗教信仰和传统亲属关系结构融合在一起以化解当地社会内部存在的压力、冲突的能力，同基督教的成功有莫大的关系。第二，民

众对基督教的反应有同情、赞赏或者敌意、怀疑，会因时因地而异。解释他们信教的动机，需要在曾发生过宗教互动的某个特定的环境中进行仔细的观察，分析同一社区中为什么有一些人从属于某一教会（教派）而另外的人却选择拒绝或者从属于另一教会（教派）。作者指出，如果将问题聚焦于某一个具体的社区，就必须跳出“要么接受，要么抗拒”的截然二分的方法。基于这种写实的描述和情境化的分析，作者认为，与其说基督教是一个纯粹的外国强迫、被动接受的过程，不如说在乡村层面上它是非常本地化的、被民众主动选择接受的过程。因为在那些官府控制相对薄弱和缺位，又有长久乡村暴力传统的地方，乡村民众相信通过从属于某一教会（教派）并且与西方传教士建立联系，就能够把基督教作为他们在当地政治生活中可资利用的资本，基督教便可以为他们提供额外的支持、保护等利益。正是因为这种复杂的动机，基督教在农村地区的发展超越了城市，农村成为基督教传教的中心。

基督教在华传教史涉及政治、文化、宗教、外交等多个领域和层面，是近代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本书作者在分析论述过程中，以历史学者应有的立场，进行了细密的叙述、深入的思考、缜密的分析和严谨的论证。虽然以基督教在潮州地区的传教为主题，但作者将基督教传教这一历史活动放在潮州社会的框架中，以中立的态度进行客观公正的论述，着重分析潮州地区乡村社会的复杂关系，而不仅限于传教活动本身，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本书是一部关于基督教传教问题的地方社会史。作者对潮州地区社会历史和地理环境的描述，对四个典型的基督教乡村的勾勒分析等均颇见功力，也正因为如此，更体现出作者独到的眼光和客观公正的立场。作者希望本书能在构建近代中国基督教的草根历史中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作为一名青年学生，我很荣幸有机会将此书译介过来，供国内学者、同仁参考。

英文版序

本书根据本人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及非洲研究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我首先要感谢狄德满（R. G. Tiedemann）教授在我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期间给予的悉心指导。他对学术研究的执著和热诚，为我树立了很好的治学榜样，也是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历史学者的风范。

其次，我要多谢以下的图书馆和档案馆，在我搜集数据的过程中所提供的帮助：伦敦大学东方及非洲研究学院图书馆、纽约佩斯大学图书馆（Pace University Library）、纽约协和神学院图书馆（The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Library）、耶鲁神学院图书馆（The Yale University Divinity School Library）、英国国家档案馆（The Public Record Office）、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汕头市档案馆、潮阳市档案馆、潮州市档案馆、澄海市档案馆、饶平市档案馆、揭阳市档案馆、普宁市档案馆、汕头市海关档案馆和香港浸会大学图书馆中国基督教历史档案中心。同时，我还要感谢胡德牧师，在他的热心帮助之下，我得以向汲约翰牧师的后人借到汲约翰的私人书信手稿。

此外，我到中国进行调查的时候，得到众多人士慷慨热情的帮助。我要特别感谢王庆成教授、陶文钊教授、宋军博士、夏宏图博

士和马钊博士，他们为我在北京及其他地方的研究工作大开方便之门；我还要感谢广州的钟鸣先生、王永昊牧师以及陈逸鲁牧师，他们帮助我找到了想要找的人；感谢汕头的温符英老师、黄挺教授、黄志仁先生和黄炳章神父所给予的帮助；感谢潮阳市基督教会的牧师和长老的接待；感谢潮阳市李绪丰世伯和张维先生，为我提供了有关潮汕地区的历史资料；感谢郭奕大世伯和他的家人，我在北京和潮汕的时候，他们邀请我去家里做客；感谢普宁县的方钦亮牧师为我安排了前往蔡口村调查的行程；最后还要感谢我的亲人们的帮助，使我得以探访古溪村的基督教会和天主教会。

与林珍珠（Jane Kate Leonard）教授的交谈和通信，对我了解晚清社会启发良多。此外，我还受惠于我的许多朋友和同事的支持，包括裴士丹（Daniel H. Bays）、陈国诚、陈明铎、丘延亮、蔡志祥、邓艳玲、劳曼（Lars Peter Laamann）、李衍政、凌爱基、朱心然、张少强等。最后，我要特别感谢 Edward R. Beauchamp 教授向罗德里奇（Routledge）出版社极力推荐拙著，才使本书有付梓面世的机会。

最后，我要感谢家父李松添和家母曾雪玉，在我伦敦求学期间给予我无尽的关爱和支持，感谢家人李佩珊、李樹鸿和李樹恩。